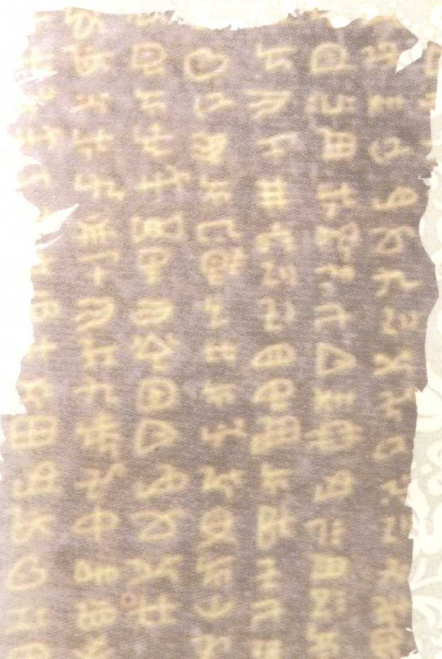


• 宗教与社会研究丛书 •

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初探

龙保贵 著



四川出版集团
蜀书社

• 宗教与社会研究丛书 •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项目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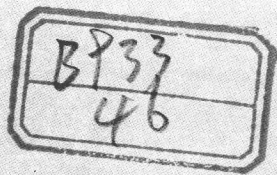
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初探

龙保贵



中医学院 0643001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省图书馆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初探/龙保贵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3

(国家“985 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丛书/卿希泰主编)

ISBN 978-7-80752-568-4

I. ①彝… II. ①龙… III. ①彝族—原始宗教—宗教艺术—研究—中国
②彝族—原始宗教—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7320 号

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初探

龙保贵 著

责任编辑	谢正强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8.875
字 数	21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568-4
定 价	26.00 元

本书藏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 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丛书总序

卿希泰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在这个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国家“985工程”开始启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名校率先获得国家较大力度的支持；紧接着，教育部又与有关部委、省市签订协议，对部分基础好、水平高的高等学校进行共建，予以重点支持。这个“工程”的实施，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迎接知识经济挑战而采取的重大决策，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大举措。经过几年的建设，“985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大大提高了社会服务工作水平，而且缩小了我国高等学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当然，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它需要

较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需要长期形成的优良学风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且需要有强大的经费投入作为支持。有鉴于此，国家于2004年6月又开始启动了“985工程”的建设工作。“985工程”的建设，是国家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创新思路而寻求高校持续性、跨越式发展的重大举措，其基本思路是：集中资源，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发挥优势，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促进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使之成为攀登世界科技高峰、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带动相应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基地，使高等学校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同时，造就和引进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加快建设一支具有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教师队伍、管理队伍和技术支撑队伍。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决定集中经费对一些高校的名牌学科进行重点扶持，使之成为汇聚人才、持续创新的“平台”或“基地”，以加快这些学科的成长步伐。

在“985工程”的建设工作中，国家尤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早在2003年教育部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2004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与此同时，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2004年6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在“985工程”建设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当前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机遇，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思想库”、“人才库”的作用。同时，周济同志还指出：我们应当推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

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孕育和催生新的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形成一批能够解决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基地。“985 工程”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设立的，其特点在于跨学科并具有开放性，能够围绕国家、区域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组织主攻方向并进行联合攻关。

在“985 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建设中，国家提出了建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经过评审，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有幸成为承担“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建设任务的主干机构。在此基础上，还整合了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和藏学研究所两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专门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中与宗教学有关的科研力量，并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级研究人员来参加建设，共同开展研究工作，以达到集合海内外本专业的学术精英和优势科研资源，突破个人分散研究的有限视野，将个人的学术专长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研究集体，故这个基地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平台。

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这一国情出发，结合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的要求，初步确定有宗教学理论比较研究、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西方宗教与当代世界研究、宗教信仰与民俗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等五个方向；考虑到目前的学术力量和国家需要等实际情况，近期拟以四大课题为主要研究内容：一是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二是中国道教思想发展与道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三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四是中外宗教的对话与交流研究。其中，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

发展研究这个课题，主要是对中国各种宗教及其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宗教现象，来对有关宗教学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而且在于通过系统考察中国各种宗教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关系，来为我们国家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中国道教思想发展与道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这个课题，主要着眼于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迁，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在当今中国社会里的作用，挖掘其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这个课题，主要研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宗教的现状和历史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其重点在于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各种宗教进行调查研究，希望这项工作能为祖国大家庭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服务，并为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促进西部大开发服务。中外宗教的对话与交流研究这个课题，目前主要是对国内外宗教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优秀学术成果进行翻译，以图加强中外的学术交流并为我国宗教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与此同时，逐步开展西方宗教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和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等方面的研究，以适应人类文化全球多元性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我们希望能够依靠“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的集体力量，在以上各个方面取得一些重大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也希望通过在创造这些成果的过程中能锻炼出一支优秀的学术创新团队。

当然，除了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并不排斥“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的成员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又决定出版一套《国家“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丛书》。这套丛书，不仅将囊括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可包括其他有关宗教研究方面的优秀学术著作。不仅出版本基地成员有关宗教研究的优

秀学术著作，而且，非常欢迎本基地以外的海内外学者向本丛书编委会申请，经过编委会评审通过之后，即可将其宗教研究的优秀学术著作列入本丛书出版。这样，或可在此建设期中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更大力度地促进我国宗教学学科的发展。

总之，“985 工程”的建设时间虽然是有限的，但我们的学术探索却是无止境的。我们希望，“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能够为今后的科研机构提供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学术研究能够为宗教学学科的发展贡献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成果，而其所培养的创新团队中也有一些人能够成为学术界未来的领军人物。同时，也希望这个“基地”能架起一座沟通国际的桥梁，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5 年 11 月 12 日于四川大学芙蓉楼

（作者卿希泰，现任国家“985 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

导 言

在伟大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人口众多、分布较广、富有文化传统的民族。彝族主要分布在祖国西南云南、四川、贵州3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主要分布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及石林彝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峨山彝族自治县、漾鼻彝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和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等，在云南100多个县市中，每个县市都有彝族分布，其中彝族人口上万人的县有80多个，彝族人口10万人以上的县有7个，即石屏、弥勒、建水、宁蒗、景东、蒙自、漾濞。四川省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贵州省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等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布在隆林各族（含彝族）自治县。从

地理位置讲，彝族居住区域大抵北自大渡河，南到云南国境线，东到乌江，西抵澜沧江、怒江，这个范围内都有彝族人口以村落为单位的零星分布。在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内也有部分彝族居住。也就是说，彝族主要居住在大小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及金沙江、南盘江、红河等河流两岸的崇山峻岭之中。

彝族分布的地区是祖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沿海丘陵之间的山岳地带，具有十分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这一地区，地势雄伟磅礴，高山耸立，层峦叠嶂，江河纵横，风景秀丽，遍地皆山，平坝极少。地理位置在北纬 $20^{\circ}\sim 29^{\circ}$ 、东经 $98^{\circ}\sim 107^{\circ}$ 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偏南，因而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一般平均雨量为 $800\sim 1000$ 毫米，常年气温多在 $10^{\circ}\text{C}\sim 20^{\circ}\text{C}$ 之间，无霜期 $250\sim 300$ 天。这里有着海拔 $3000\sim 3500$ 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如滇东、黔西乌蒙山两麓和大凉山部分地区；又有 $1000\sim 1500$ 米的山区和半山区，如哀牢山和无量山一带；也有 1000 米以下的丘陵山地和河谷，如金沙江、红河谷地带。彝族绝大多数居住在山区，部分在高寒山区，少数在平坝和河谷地带。

彝族居住的祖国西南地区是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宝库，是古猿人的一个重要发祥地。如：1500万年前云南开远市小龙潭煤矿亚洲人类始祖“腊玛古猿”化石，800万年前的云南“禄丰古猿”化石，40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县蝴蝶岭的“猿人岔科”化石和250万年前的“东方人”化石以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其中“元谋人”化石出土的地方，同时出土了灰烬，还有烧得焦糊的兽骨化石，说明“元谋人”已经学会用火、吃熟食。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元谋人”是中华民族远古祖先。除此，20世纪50年代至今，彝族地区先后发现了许多旧石器和新石器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很多有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及古生物考古价值的文物，为我们研究彝族地区原始社会或者

更早一点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科学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二

关于彝族的族源，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和观点，有氏羌说、云南土著说、北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和东来说，以及濮人说、卢人说、卢戎说等等，迄今尚未定论。比较多的看法，认为彝族先民与远古时期的氏羌族群有渊源关系。直言之，彝族是以从“旄牛徼外”南下的古老羌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为基础，南下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部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彝族是古氏羌人在南下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氏族部落融合形成的民族。古氏羌分布在陕、甘、青一带。约在4000~5000年以前，其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氏族部落融合为僰或濮。僰系“羌之别种”。公元前4世纪，羌人无弋爰剑之后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山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嶲诸羌，与司马迁《史记》所载的僰、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氏羌与西南土著氏族部落融合为僰的基础上，与僰或濮的融合是彝族形成过程中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魏晋以后，昆明人与僰或濮的容融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所居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来，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出现游牧氏族部落与定居农牧

氏族部落分化。游牧氏族部落是嵩、昆明；定居氏族部落是夜郎、滇、邛都，各自分布于今贵州安顺、云南晋宁、四川西昌一带。与此同时，彝族传说自“六祖”后十余代约当西汉中、后期，产生兹（君）、莫（臣）、毕（师）、革（匠）、卓（艺）五种等级的分化。其中前三者为统治者，后两者为被统治者。彝族历史文献中则有“六祖”畜牧氏族部落征服濮人农牧氏族部落的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地彝族先民居住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王、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氏族部落的基础上，昆明或“六祖”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氏族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公元8世纪前后，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和云南洱海地区出现了6个奴隶主集团，史称“六诏”，其中“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83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的包括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等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并由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对彝族先民居住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史称“罗氏鬼主”。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原来的氏族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族骑兵自四川分3路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土司的争取工作，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建立彝族土司。

明代（1368~1644）276年间，地跨云、贵、川3省的水西（贵州大方）、乌撒（贵州威宁）、乌蒙（云南昭通）、芒部（云南镇雄）、东川（云南会泽）、永宁（四川叙永）、马湖（四川屏山）、建昌（四

川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土司、黑彝、白彝与奴隶的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度的上层建筑。

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各地彝族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如在东川、乌蒙、滇南等地,清乾隆十一年(1764),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逐步侵入,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各彝族地区,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说,民主改革前,由于居住分散,历史、地理条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滇、黔、桂绝大部分彝族地区的社会已进入了封建地主制;滇东北、黔西南部分地区尚存有领主经济的残余;而彝族聚居的川滇大小凉山还长期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滇南石屏、峨山、新平、元江四县的彝族支系山苏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残余制度。另外,在云南滇越铁路沿线的彝族地区,已有资本主义因素。在滇东北地区出现了以龙、陇、卢、禄、陆、安6大家族为主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滇南红河流域部分特别是红河南岸、李仙江流域仍保留着封建土司制度和封建地主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相继粉碎了封建制和奴隶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彝族地区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三

彝族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因素，支系繁杂，族称复杂，在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自称和他称。据不完全统计，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分布在广大彝族地区的自称有纳苏颇、诺苏颇、尼苏颇、聂苏颇、罗罗颇、撒尼颇、罗婺颇、尼颇、阿细颇、阿哲颇、保保颇、阿务颇、勒苏颇、濮拉颇、撒梅颇、保罗颇、腊鲁颇、俚颇、罗颇、纳罗颇、黎颇、阿祖颇、阿租、阿武颇、阿多颇、濮瓦颇、葛颇、戈濮、他鲁颇、撒摩都、六得濮、纳查、咪西苏、子君、罗米颇、纳若颇、弥腊颇、吉输颇、他谷颇、拉乌颇、苏拉颇、母基颇、母鸡颇等三十多种。还有数十种他称，如黑彝、白彝、干彝、甘彝、青彝、花彝、三道红、花腰、白罗罗、彝族、土家、香堂、花濮拉、黑濮拉、笕箕濮、哈窝帕、卜拉帕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彝族人民的意愿，统称为彝族。彝之“彝”字，有“米”有“系”，丰衣足食，不仅从汉文字义上具有庄重、古老之美意，也是概括了绝大多数彝族称谓中汉字的音译。

彝族有自己共同的语言。彝语系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和东南部等6个方言。虽各个方言之间有较大的差别，但在彝语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特别是越古越相同。在历史上彝族人民还创造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字，有内容丰富、类别繁多、卷帙浩翰的彝族历史文献和金石铭刻。彝文昔时汉文史志史书称为“爨文”或“𪛗书”、“罗罗文”，亦称“毕摩文”、“西颇文”及“夷经”。彝族历史文献是彝族历史珍贵的文化遗产，内容主要涉及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医学、文字、天文历算、伦理道德、习俗、谱牒、

军事等方方面面。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夜郎史话》、《勒俄特依》、《吾查》、《们查》、《苏颇》、《苏嫫》、《阿赫西尼摩》、《查姆》、《尼苏夺节》、《彝药志》、《阿诗玛》、《普兹楠兹》、《六祖魂光辉》、《祭龙经》等。综观彝族历史文献，以宗教经典最为突出，有作斋经、作祭经、指路经、占卜经、百解经、福禄经、驱除经、攘福经、祭祖经等。有用彝文镌刻的碑铭如明代云南禄劝县的《镌字崖》、贵州大方县的《新修千岁碑记》、《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记》，也有木刻印刷的彝族历史文献，如云南元江县的《色尾处嫫》（《做人之道》）、云南石屏县的《爱简申觉》（《教育经》），四川凉山的《玛木特依》（《教育经典》）、云南禄劝县的《劝善经》（《太上感应篇》）。还有口碑古籍如云南的《梅葛》、《阿细先基》、《逃婚的姑娘》、《阿哲古歌》、《南诏国的官灯》、《南诏魂》，四川凉山的《妈妈的女儿》及广西、云南交界处的《铜鼓王》等等。最近，中共楚雄彝族自治州党委、人民政府，筹资千万，成立了以州长为组长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编译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主及联合滇、川、黔、桂4省（区）彝文文献翻译、整理、研究机构或个人，组织编译整理出版《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0卷，到2009年年底，已编译整理出版发行了《彝族毕摩经典译注》80卷，2010年全部编译整理出版完毕，以便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创造并传承着自创为主的属本土本民族宗教，即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曾有前辈说，彝族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多神崇拜的民族。在这些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中，往往伴随着原始宗教艺术文化，即原生态音乐歌舞艺术、原生态民居建筑艺术、原生态雕刻绘画艺术、原生态服饰工艺、原生态编织工艺等。在很大程度上，它既是彝族传统原生态艺术文化，又是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从民族艺术文化发展的迹象看，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是彝族传统原

生态艺术文化的缘起和雏形，因为彝族传统原生态艺术文化除功利目的外，几乎或多或少带有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的具体意义、表现特征和深刻内涵。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就没有彝族传统原生态艺术文化，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是彝族传统原生态艺术文化的源头和缘起乃至鼻祖，彝族传统原生态艺术文化是彝族原始宗教艺术文化的发展和丰富完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完善、丰富发展。

我们不妨看看彝族房屋建筑艺术文化，居住在云南石林、弥勒、泸西及石屏、建水、个旧、蒙自、红河、绿春等县自称阿细颇、撒尼颇、尼苏颇的彝族住宅山墙人字形顶角上，常见墨绘或墨色加彩的蝙蝠、松枝、鱼、马鹿、鹿子、麒麟、老虎、蛟龙、蝴蝶、青竹等装饰图形。家堂正墙贴“天地国亲师位”处，有些彝族用图画象形文字描绘出太阳、龙、虎。虎神、天神、土地神、开路将军、火神、牛神、瘟神、虫神8大神，六畜、三叉、弓箭、犁、耙、抓耙等农猎事工具和香案，组成一幅红底墨画，作挂于中堂的神祇神物供贴，其上所表现的对象均以简练线条勾勒轮廓，看形识物，一目了然。相传这类画和文为一体，在彝族民间流传甚久，并有悠久的历史^①。

说实在的，约当中原春秋战国时期，与彝族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各民族歌舞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云南楚雄（万家坝）、南涧、弥渡等市县出土的早期型铜鼓、编钟，均属配套使用的古乐器。证明彝族先民及周围其他民族在当时已经有了较高水平的音乐舞蹈活动。

战国至两汉的“滇国”，民族歌舞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云南祥云（大波那）铜葫芦笙、编钟和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大批青铜乐舞俑，青铜器上的乐舞形象、乐舞纹饰，反映和

^① 杨德盛. 彝族古代毕摩绘画·序 [G].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1.

折射出当时民族乐舞兴旺鼎盛的局面。诸如铜鼓舞、葫芦笙舞、羽舞、干戚舞、铃舞、徒手舞、踏歌之类道地的“西南夷歌”、“文成颠歌”，至今还可以在广大彝区寻到它们的遗踪。所以，古代史家曾说“蛮夷之乐，有铜鼓焉”，“俗尚铜鼓……时时击以为娱”。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还铸有一件曾盛传于中原，它在这里则是与滇人的铜鼓合奏的和谐场面。有趣的是，地处滇东南的彝族支系“僰人”仍分别有数量可观的传世铜鼓及其世传铜鼓乐舞。铜鼓舞典型的闪动韵律与打歌、跌脚、跳笙的步法、动律如出一辙。铜鼓舞是古代跌脚之类的舞蹈基础上派生发展出来的，它的风格属于舞族跌脚、打歌、葫芦笙同一系统。

在云南弥勒县金子洞坡崖画、石林县石林崖画、丘北县狮子山崖画的祭祀舞蹈场面、杂耍、羽舞人等图像，与汉代两次由滇入洛阳宫廷献艺的乐舞有某种关联。在汉代曾风行于川、黔、滇之间的“巴渝舞”及彝文史书《西南彝志》中记载的战阵舞与遗存至南诏、大理的器械舞均有传承关系。现存众多彝族兵器舞中还能窥知古代刀光剑影的场景。

特别是彝族形成期的南诏时代（公元8~10世纪）宫廷乐舞和民间歌舞再度辉煌。8世纪初叶，彝族先民联合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南诏王大量启用白族、汉族官员，广采博收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技术，将南诏艺术推向西南艺术史的巅峰期。南诏宫廷乐舞的发展以大型歌舞《南诏奉圣乐》为标志，它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同时期被朝廷纳入唐代14部国乐（《唐会要》）的其他各部乐并驾齐驱于盛唐乐舞坛。与《南诏奉圣乐》相适应的是南诏时代所建立的完整的礼乐制度。在南诏政权最高文职官署“九爽”中，专设有主管礼乐的“慈爽”官职。在宫廷仪仗队中伎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凡对内、对外的重要场合，均有南诏伎乐吹奏表演。